联合国 S/PV.8798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七九八次会议

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于尔根松先生	（爱沙尼亚）
	中国	耿爽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印度	拉古塔哈里先生
	爱尔兰	伯恩·内森女士
	肯尼亚	基马尼先生
	墨西哥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
	尼日尔	阿巴里先生
	挪威	赛义德女士
	俄罗斯联邦	波利扬斯基先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金女士
	突尼斯	拉瓦尼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吴百纳女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德劳伦蒂斯先生
	越南	邓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S/2017/507）的执行情况

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

2021年6月2日爱沙尼亚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1/527）

根据2020年3月2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常驻代表的信（S/2020/253）中所述、安全理事会成员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将分发附件汇编(S/2020/572)，对安全理事会本正式记录加以补充，汇编内载有关非安理会成员提交的发言稿。

21-15419 (C)







上午10时05分开会。

悼念爱德华·勒克教授和日本的大岛贤三大使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讨论议程上的项目之前，我们应当悼念爱德华·勒克教授和日本的大岛贤三大使，他们都在安全理事会上次讨论这一议题（见S/2020/418）后去世了。这两位杰出人士都为审查和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做出了广泛贡献——勒克教授在一年一度的“立即进入角色”研讨会中组织了活跃的讨论并撰写了报告，大岛大使在振兴安理会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促成了第一份全面的“507号说明”文件（S/2006/507）。他们都将被安全理事会成员怀念。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S/2017/507）的执行情况

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

2021年6月2日爱沙尼亚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1/527）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程序》第四版的共同作者洛兰·西弗斯女士和安全理事会报告组织执行主任卡琳·兰德格伦女士。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1/527，其中载有2021年6月2日爱沙尼亚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信中转递了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说明。

在本次会议上，安理会将听取西弗斯女士和兰德格伦女士的通报、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因加•罗恩塔•金大使以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身份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金大使发言。

金女士（以英语发言）：我欢迎有此机会作为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然而，在发言之前，我也要悼念爱德华·勒克教授和日本的大岛贤三大使，他们都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做出了广泛贡献，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

一年多前，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安全理事会的牢固运作模式造成了一些严重干扰。虽然安理会任务的核心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但我们履行该任务的能力受到了挑战。我们不仅无法举行到场会议，而且与广大联合国会员国互动的能力也受到了挑战。安全理事会被迫根据《联合国宪章》考虑并采取新的运作模式，以确保继续运作。

自2020年3月中国担任主席开始（S/2020/253），安全理事会通过一系列信函，根据情况调整了工作方法，以保持有效运作，各继任主席国延续了这一做法。自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出现大流行病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安全理事会继续不间断地召开到场会议和视频会议，谈判并通过决议，确保及时延长任务期限，并保持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接触，特别是每月举行工作方案通报会和总结会，并在公开视频会议中使用多种语文。尽管存在一些未决问题，但安全理事会一直能够确保持续运作，并力争确保透明度、效率和效力。

我们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特殊情况下开展工作，这表明安全理事会必须保持灵活，及时应对所有可能扰乱其运作的情况。2020年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会（见S/2020/418）的主题是“确保透明度、效率和效力”。虽然我们强调了这些要素的重要性，但提出的灵活性概念对安理会的工作也同样重要。随后的分析性摘要中概述了一些发言和提交的材料，其中载有与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有关的一些提议和意见。在这方面，联合国会员国审议了疫情期间采用的临时做法，这些做法可以在安理会正常运作期间采用，以提高其效能。今年，公

开辩论的主题是“灵活性和创新：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对未来的经验教训”。这一主题可以被视为去年公开辩论的续篇，因为它旨在思考我们已经走过的路程，并敦促我们展望未来。

因此，非正式工作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框架，我们可以在这个框架内评估和改进工作方法。所以，工作组继续几乎每五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在常设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S2017/507)的执行情况：历任主席的思考和今后行动建议”下，主席有机会思考在各自任期内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评估一些最佳做法、挑战以及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领域。该议程项目有助于思考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以及主席的说明S/2017/507，该说明载有许多有用、却有时被忽视的规定。为了确保我们在通常情况以及非常情况下有效、高效和透明地运作，我们必须继续执行该项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和随后通过的所有说明中的所有规定。

我要回顾爱德华·勒克教授在去年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他指出，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如何充分和忠实地执行各项措施。还应该指出的是，非正式工作组正在审议关于分发来文供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做法和程序，以提高透明度和加强效率。

我们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慢慢逐步返回安理厅。2020年7月，在德国担任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恢复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厅举行实际到场会议，2020年10月，在俄罗斯担任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恢复了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举行到场会议。安理会还举行了视频和到场相结合的会议，最近几周的通报会和磋商大多采用到场会议的形式。本月，预计大多数会议将在会议厅举行。因此，本次公开辩论会为安全理事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听取广大会员国就安理会取得的成就发表的评论，以及如何进一步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建议。在我们恢复正常运作之际，这次对话的时机是十分恰当的。

COVID-19疫情造成的意外挑战和限制，令我们考虑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非常情况，例如视频会议的地位，如何更好地促进广大会员国有意义地参与视频会议，如何确保在视频会议上使用多种语文和编制视频会议的全面记录，以及在无法举行到场会议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程序性表决。然而，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和创新的方法来维持持续运作，包括使用技术来维持运作。我借此机会确认并强调普遍的立场，即现代技术绝不可能取代安理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和亲自参与的质量，包括在安理会正常会议间隙进行的宝贵讨论。

工作方法仍然是安全理事会有效执行任务的基础。尽管我们面临严峻挑战，但改进工作方法并使之适应当前情况的进程决不能动摇。在我们努力提高和保持安理会的效力、效率和透明度及其准备状态和灵活性时，我期待着联合国会员国提出建议。我毫不怀疑，这是我们大家都全力以赴的集体事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金大使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西弗斯女士发言。

西弗斯女士(*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邀请我以通报人的身份参加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主席先生，我还要与你和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一道，向爱德华·勒克教授和大岛贤三大使表示敬意，他们都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都是杰出的人士。

今年公开辩论会的主题选得很好。在这一过渡阶段，很有必要评估安全理事会如何应对疫情所造成限制的挑战，不仅要找出应对今后局势的最佳做法，而且要找出疫情期间哪些做法可能值得推广到正常时期使用。

金大使就疫情期间安全理事会如何处理业务连续性问题作了很有见地的通报。去年，最紧迫的问题是安理会如何通过决议。2020年3月12日之后，安理会不得不停止召开到场会议，但有两项任务规定需要在该月底之前延长。

安理会面临的一个特殊困难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大会决议是建议，而安理会决议，根据其措辞而定，是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出于这个原因，任何替代亲自投票的做法都必须经得起严格的法律审查。

因此，按照安全理事会主席信中的规定(S/2020/253)，安理会必须在2020年3月底之前同意书面表决程序。这一程序可能过于耗时和复杂，可以进一步完善。但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满足合法性和可核查性的必要要求。

安全理事会主席就疫情期间安理会的工作方法问题发出了16封信。一些方法延续了之前商定的做法，另一些则体现了新的做法，特别是视频会议方面不断演变的做法。因此，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安全理事会是否应该将这些工作方法综合起来，供今后参考。这方面有几种备选做法。

第一种备选做法是编写一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将安全理事会主席信中最新的内容提炼成一份单一的文件。

第二种做法是由主席就各个工作方法分别编写说明，这些工作方法既适用于限制时期，也适用于正常情况。

第三种做法可以是遵循1996年维斯努穆尔蒂准则的模式或S/2017/93号文件所载的2017年别所的信。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一名安全理事会代表以个人身份起草了一份关于秘书长提名程序的参考文件。

第四种做法可以是秘书处编写一份背景说明，类似于关于阿里亚模式会议的背景说明，经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同意，由主席在安理会正式会议上宣读作为记录，然后列入日本出版的安全理事会手册。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如果安理会同意建立一种记录，可取的做法或许是表明，虽然疫情期间的工作方法是协商一致的产物，但一些安理会成员提出了未达成协议但可能值得今后审议的其他方式或替代方式。

我现在想提出一个与恢复面对面会议有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适用于所有正式会议。有助益的是，根据规则，程序问题上的分歧可以通过程序投票来解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不被视为正式的会议——包括COVID-19疫情期间迄今为止举行的视频会议。对这些会议而言，几乎所有程序问题的决定都必须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有时会造成延误甚至障碍。

这么多个月来在没有议事规则的情况下运作，让安理会成员对规则有了新的认识。尽管如此，近年来这些规则一直处于被误解的阴影之下，因为规则的标题仍保留着“暂行”一词。我想借此机会澄清这个问题。

当人们认定“暂行”一词是“草案”的意思，并得出结论认为议事规则从未获得通过，而是以松散的指导原则形式存在，可由安理会成员随意搁置时，误解就会产生了。这一认定对安理会的声誉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

议事规则从未获得通过并非事实。议事规则最初是在安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以便安理会能够开始其正式工作。然后，从1946年4月至6月，安理会通过了若干修订案，议事规则被视为足够完整，可以文号“S/96”印发，该文号沿用至今，目前版本的文号是 S/96/Rev.7。因此，根据关于《联合国宪章》的主要法律论述，安理会的规则具有与大会和联合国其他主要机关的规则同等的法律地位。

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主要机关在议事规则通过后就删除“暂行”一词，而安理会却仍在标题中保留“暂行”一词？原因是安理会仍被困在一个其他主要机关不必面对的问题上——即《宪章》第二十七条为安理会规定的独特表决安排。由于冷战的紧张局势，安理会成员无法就其议事规则应在何种程度上对表决安排作出规定一事达成一

致意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公布规则时，保留了“暂行”一词。这只是一个政治信号，表明尽管安理会通过了议事规则，但它打算重新审议悬而未决的表决问题。

直至1950年代结束之前，这些表决问题一直都是在实践中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解决的。但“暂行”一词仍保留在标题中，经过这么多年之后，许多人开始忘记议事规则是在1946年通过的这一事实。

当然，如果安理会同意从标题中删除“暂行”一词，对议事规则法律地位的误解就可以消除。然而，为此重新开放审议议事规则无疑会引起人们质疑一些经过多年已经过时的规则。要解决这些规则的问题，就必须进行彻底的、可能会引起分歧的审查。为此，尽管截至1982年，有7项修正案经由决议获得通过并直接载入议事规则，但在1993年和2019年，安理会却只能通过发布主席说明来商定修正案，而这些改动尚未反映在议事规则的内容之中。

虽然我认为许多人也会认定修订议事规则将是有益的，但鉴于安理会目前面临许多有争议的实质性问题，我不确定此时试图修订规则是否会产生最佳结果。然而，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令人放心的是，需要修订的规则主要与文件编制有关。

这是一个冗长的解释，但我认为重要的是，确认指导正式会议进行的议事规则——即恢复面对面会议时对安理会成员最重要的那些议事规则——是有效的。可以适用并依赖目前拟定的这些议事规则。

最后，大会于6月11日审议了安理会2020年年度报告（A/75/2）。根据安理会临时工作方法，非安理会成员国家参与安理会工作的机会较少，对此有相当多的批评。然而，安理会在疫情期间确保工作连续性的灵活态度得到普遍的尊重。我赞同这种尊重的态度，并期待着看到安理会将如何把所吸取的经验教训转化为下一阶段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西弗斯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兰德格伦女士发言。

兰德格伦女士（*以英语发言*）：应邀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是安理会报告组织的荣幸。安理会报告组织的目的是，以知情和公正的方式促进安理会的效力、透明度和究责制度。

让我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罗恩塔•金大使在主持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爱沙尼亚作为副主席所发挥的作用。我还要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程序》第四版的合著者洛兰•西弗斯致意。

在安理会及其附属机构除一次以外，所有会议都是2020年3月中旬以来首次面对面举行的这一周，来到安全理事会会议厅，特别令人感到高兴。去年3月，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及其对纽约市的残酷影响，安全理事会采取果断行动，商定了临时工作方法。安全理事会这样做，忠实地遵循《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八条，并迅速恢复持续的会务活动——这是除秘书处之外的第一个恢复正常工作的主要机关。

安全理事会就新的工作方式迅速达成一致是历史性的。这些开创性的安排现在已经接受了15个月的考验。成员们发现视频会议可节省大量时间。更多的部长和政府首脑参加并主持安理会的公开辩论会。附属机构的会议不会因为缺少会议室而受到限制。每天的议程和决议草案现在都以电子方式分发，这是具有环境意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数字平台确实向安理会展示了其价值。

与此同时，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而实施的限制直击国际外交的核心，致使安理会成员没有面对面的谈判，也没有许多非正式的机会来探索可能的前进道路，从而加深人际关系、让信任得以发展。安理会新的最佳做法可能是平衡远近的混合工作方法。

2020年3月底，安理会报告组织指出，虽然许多技术难题已逐步得到解决，但程序上出现了一些根本性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视频会议是否被视为安

理会的正式会议。安理会报告组织提出问题：如果视频会议不被视为正式会议，安理会将如何执行某些重要任务，例如通过决议延长将要到期的任务？

安理会很快找到了执行其最重要任务的方式。它延长了特派团和制裁的任务期限，甚至还确立新的和平行动，同时就其议程项目举行通报会和辩论会。视频会议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有时使之变得更加容易。在过去一年的安理会视频会议当中，技术故障越来越少，使用者越来越熟练。对安理会数字平台上所存在安全风险水平进行重新评估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

安理会的创新是否以任何方式限制其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职责的能力？在这15个月里，安理会没有增加任何新的议程项目。将视频会议定为非正式会议的决定，可能会对安理会的工作程序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限制。对决议进行表决是正式会议的一个特点，但却受到书面程序的阻碍。伴随表决的解释投票理由的发言有利于安理会的透明度，但已被取消。非公开磋商旨在为坦率讨论创造条件和避免事先准备好的发言，总体上似乎变得更加正式，使用新闻稿让公众了解情况的做法在2020年3月开始采用时情况很好，但现在似乎已经减少。程序性投票需要召开正式会议，在通过视频举行的会议上没有举行过。安理会成员或许希望认真考虑如何能够进行程序性表决，并考虑把视频会议作为正式会议对待。

2020年3月，主席的每月来信成为了传达安理会商定的临时工作方法的工具。这些信件本身就是一种新工具，表明安理会主席在形成更好的工作方式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面对面会议和旅行恢复，也许没有什么比实地参与和平行动和处理其他令人关切的局势更紧迫了。安理上次派团出访至今已有20个月。一些当选成员即将开始其理事会任期的最后一个季度，却从未参加过安理会的实地考察。精心设计的实地访问可以加强安理会成员对实地实际情况、其所作决定的影响以及执行任务授权面临的挑战的认识——在联合国寻求加强“以行动促维和”倡议影响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

尽管如此，安理会仍有可能从实地访问中获得更多价值。在可能的情况下，安理会可以考虑统筹安排它本身的行程安排以及制裁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和建设和平委员会负责人的行程安排，从而提高一致性和有效性。还可以重新审视安理会访问团是否需要无所不包。这些访问往往花费极高，但时间短暂，而且日程排得很满。去年底，一位在“立即进入角色”研讨会上发言的人说，来访的安理会成员“往往从机场前往会议室，然后又回到机场，没有时间充分了解实地情况”。

过去几年中，安全理事会成功派出了由安理会部分成员组成的小型访问团。最近一次是在2012年11月，当时六名安理会当选成员在联合国行动即将结束前前往东帝汶，在该国停留了四天。这增加了在实地的时间，可以扩大有效外交的可能性。难道现在就不能这样做了的吗？例如，对于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这种新特派团就可以，或许对于不在安理会议程上的少数局势也可以。留在纽约的安理会成员可以在选定的时间通过视频会议加入这些访问团。已故日本大使大岛贤三以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主席身份于2005年11月访问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时，安理会也只是请一名成员代表它前往。

安理会已经证明，它可以利用暂行议事规则和《联合国宪章》来进行创新和有效开展工作。这种积极利用现有工具和迅速开发新工具的做法并不需要随着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消退而结束。当安理会恢复举行面对面会议时，该机构及其成员在COVID-19时期表现出的灵活性必须保留下去。安理会可以保留现有的良好做法，恢复有价值的旧的举措，并继续探索新方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兰德格伦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耿爽先生（中国）：中方感谢爱沙尼亚倡议召开此次公开会，感谢安理会文件和程序工作组主席金大使、以及希尔弗斯女士和兰德格伦女士所作通报。

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新威胁，安理会需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确保公平公正，体现开放包容，提高效率效力，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安理会制定了疫情期间临时工作方法，克服了诸多不便，保持正常运作。回顾过去一年的实践，我们有必要总结经验、查找不足，着眼安理会面临的现实任务和未来挑战，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

结合中国去年3月和今年5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经验，我愿同大家分享以下看法。

一，维护团结、集体决策。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全球挑战，安理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践行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安理会成员要注重维护安理会的团结，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增进互信、凝聚共识。15个成员保持团结一致，是安理会力量的体现，权威的来源。我们要加强沟通，充分照顾彼此关切，优先争取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分歧，避免一言不合就诉诸表决的情况。

二，聚焦责任、突出重点。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林林总总，安理会不可能也做不到包罗万象，必须集中精力解决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紧迫问题。近年来，安理会讨论的议题逐渐膨胀，我们对此感到关切。安理会应保持工作重点的连续性，对引入新的议题持慎重态度。安理会在讨论综合性议题时，应注重与联大等机构加强协调，避免侵蚀联大职权，造成重复劳动。

三是广泛沟通、公开透明。安理会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使职责，在处理热点问题时应注意倾听广大会员国，特别是当事国、地区国家、区域组织的意见，充分发挥它们的独特优势。安理会应组织灵活多样的实地访问，围绕相关议题举行非正式对话，用好维和工作组、出兵国会议等机制，在制定维和行动授权、保护维和人员安全等问题上重视听取各方特别是出兵国的意见。在担任5月轮值主席期间，中方就热点问题广泛听取当事国及区域组织意见和看法，同联大主席、经社理事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等进行了沟通协调，取得良好效果。我们支持安理会同建设和平委员会加强互动，发挥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积极作用。

安理会应兼顾效率和透明，把握好公开和闭门会议的平衡。中方支持安理会同媒体加强沟通，但对正在磋商的安理会文件应做好保密，不能随意泄露，避免影响各方达成共识的努力。

四是完善机制、体现公平。安理会应坚持务实高效，不断优化工作机制。联大上周五选举出了新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中方支持为新当选成员履职提供更多便利，包括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加强能力建设，提前熟悉安理会及下属机构工作。

安理会议题执笔国的分配要更加合理，体现责任分担、共同参与。中方支持多个安理会成员担任共同执笔国，鼓励非执笔国成员也积极为文件起草做贡献。

安理会轮值主席作用特殊，前后任主席应当加强协调，努力推动安理会工作体现相互衔接、保持总体一致。

五是保持创新、灵活应变。新冠疫情对安理会工作的考验前所未有。去年3月，安理会克服重重困难，探索出一套应急工作模式，很多做法前所未有。这些做法丰富了安理会工作方法，其中的良好实践需要坚持和发扬，以利于安理会未来应对突发状况。有些地方还可改进和完善，比如视频会议的稳定性、翻译平台的质量等。当然，应急工作模式只是临时举措，不是长久之计，不能取代正常的工作模式。

我们很高兴看到，安理会5月底以来逐步恢复了实体会。目前疫情风险还在，安理会下阶段应在继续防疫不放松、科学民主做决策的基础上，稳妥做好实体会的各项安排。

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进程。中方愿同其他安理会成员一道，不断总结经验，稳步改进提高，持续完善工作方法，推动安理会更好履职。我们支持安理会文件和程序工作组继续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基马尼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要像因加•罗恩塔•金大使那样，赞扬爱德华•勒克教授和大岛贤三大使对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所做的贡献。

我荣幸地代表安全理事会现任十个当选成员（十当选成员）发言，它们是爱沙尼亚、印度、爱尔兰、肯尼亚、墨西哥、尼日尔、挪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突尼斯和越南。

请允许我表示，我们赞赏主席国爱沙尼亚召开今天的会议，并邀请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以书面形式参会。在这个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我们仍需特别小心的时期，如此安排是必要的。

我们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安全理事会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因加•罗恩塔•金大使、“安全理事会报告”组织执行主任卡琳•兰德格伦女士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程序》(第4版)合著者洛兰•西弗斯女士作了富有见地的通报。

当这场大流行病去年爆发时，没有人知道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因为我们对它毫无防备。我们应该赞扬安理会迅速作出反应，制定与COVID-19有关的工作方法，以适应局势并确保业务连续性。我们必须回顾这些工作方法，使那些能够继续加强安理会工作的方法正规化。

灵活性在我们的工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是安理会有效运作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不应妨碍对透明度、问责、效率以及在安理会与联合国其他机关和机构之间搭建有效桥梁的重视。事实上，大流行病显然要求我们有意识地暂时停下脚步，回顾过去，考虑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向前迈进，并确保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以及所吸取的经验教不会被历史所遗忘。

相反，为了子孙后代，必须将安理会的工作记录在案，使这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也能起到改进安理会工作的作用。因此，在我们即将摆脱疫情之际，我们需要着眼于未来，商定能够经受住大流行病和今后安理会正常工作所遭受的任何其他重大干扰的工作方法。

我们可以首先同意将视频会议视为安理会正式会议，适用同样的暂行议事规则，允许非成员参加，可就程序和实质性事项进行实时表决，充分规定使用多种语文，并确保保存相应记录，而不是再次制定临时特别措施。作为第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十当选成员的身份积极参与由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主席的非正式工作组的工作，以确保拟定目前正在讨论的八份说明草案。

在我们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过程中，安理会如何继续履行其职责的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促使人们呼吁安理会提高透明度，包括举行更多的公开会议，扩大妇女、民间社会和青年等利益攸关方的代表性，以及与媒体互动。这与逐步改进工作方法以及执行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S/2017/507和暂行议事规则相呼应。

安理会越来越频繁地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会议和磋商。以虚拟形式工作的好处之一是能够确保世界各地广泛利益攸关方的通报人出席。遗憾的是，2020年，根据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的女性通报人大幅减少。

安理会每月轮值主席可通过与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媒体、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接触，包括

通报工作方案、举行总结会议以及编写每月评估报告，在增强安理会工作透明度方面发挥特别作用。我们还欣见，主席每月作出执行第507号说明和2019年八个相关说明的承诺并将这一承诺公之于众的做法日益增多，我们强调，主席在其任期内在创造和测试新做法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这一过程并非没有挑战。然而，这些挑战也为安理会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巨大机会。工作上的业务连续性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秘书处的技术能力以及确保虚拟公开辩论会能够让广大联合国会员国也参与的政治意愿。非安理会成员国的书面发言并不能恰当地取代它们对此类辩论会的参与。一种渐进的办法是，考虑举行实际和虚拟参与相结合的会议，以便吸引各类通报人参与选定的活动。

安理会从了解冲突的实际环境中受益匪浅，正因如此，实地访问极为重要。过去一年中，因COVID-19而必须采取的预防性旅行限制措施使安理会工作的这一重要方面受到很大阻碍。不过，随着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访问可以如我们目睹的那样以虚拟方式进行。我们敦促只有在不可能旅行的情况下才进行这种虚拟访问，而且访问频率应与实际访问相同，以使安理会能够继续更加灵活、反应迅速，为其预防任务作出贡献。

在安理会受到更多审视之际，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透明度、效率、效益、民主、包容、问责和平衡。安理会需要在公开会议和非公开会议之间取得健康的平衡，既要提高其工作的透明度和可见度，又要鼓励更多的讨论互动和建立共识。

在这方面，为了实现有效参与并与促进使用多种语文相一致，十个当选理事国敦促投入努力，确保提供口译，包括为非公开会议提供口译。我们还欢迎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目前参与分析如何加强和改进分发来文供安理会审议的做法和程序。

十个当选理事国认为，本着分担责任的精神，通过在安理会所有成员之间更平等地分配工作，可以以最佳方式实现这些理想。因此，我们敦促促进离任、现任和即将上任的当选理事国之间的合作，以帮助保持迫切需要的连续性。

为确保十个当选理事国顺利过渡，应在新成员当选后立即进行能力建设。设想的能力建设将涉及附属机构主席帮助新成员更清楚地了解担任附属机构主席需要做的工作。这还应有助于揭开有关执笔方安排的神秘面纱，并在各执笔方和共同执笔方之间建立联系。

为了提高透明度以及公平、平等地分配工作--包括目前的执笔方同意与有宝贵经验可以贡献的十个当选理事国共同担任执笔方的安排--必须执行第507号说明中关于遴选附属机构主席的规定。特别是，在选举后应尽快与新成员开始非正式磋商进程，并与设想的能力建设同时进行。

遴选过程必须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并确保在分配角色时考虑到新成员的意见。当选成员的专长应该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额外因素。在这方面，当选成员提出的协商一致建议需要得到尊重。为了提高效率和平稳过渡，遴选过程应及时进行，使新成员能够在10月1日开始的观察期内密切监测并更好地了解他们将担任主席的附属机构的工作。

定向制裁是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威胁的重要工具，因此对执行安理会的任务至关重要。十个当选理事国强调制裁委员会工作中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重要性。工作方法必须符合国际正当程序标准。

我们坚信，有必要提高联合国制裁的效率，为此要加强公平、明确的制裁制度程序，包括建立类似于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制度监察员的审查机制。

此外，安理会应该考虑到制裁在冲突的不同阶段的效力，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定期审查,酌情暂停、取消或加强措施。

关于包括制裁委员会在内的附属机构的工作方法，需要遵循透明、公开和循证的方法。提交审议的任何议程项目，以及搁置列名请求或有关委员会事务的其他事项，都需要得到书面支持，并由提出请求的成员提供必要的理由，以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并确保有效保存记录。这也将有助于维护各委员会和安理会工作的信誉。

为了促成安理会既要灵活和提高透明度，又要防止冲突的各项努力，我们敦促继续与区域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定期接触。这不应仅限于标志性事件，还应包括出现的热点问题，例如交流区域管理大流行病的经验。与区域组织的接触也表明了《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在执行安理会任务方面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十个当选理事国成员回顾，在2020年5月15日举行的关于安理会工作方法的视频会议上(见S/2020/418)，强调了安全理事会改革以反映当代现实的迫切需要。虽然安理会需要更有效率、更具代表性、更透明、更负责、更民主，但它是在拥有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组成方面落在后面的唯一联合国机关。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也继续阻碍安理会就重要议题采取行动。

我们呼吁在否决权的使用上力行克制，特别是事关旨在防止或结束大规模暴行罪的行动--这是安全理事会任务的核心。因此，这些失衡问题应该得到解决。

最后，主席先生，十个当选理事国向你保证，承诺履行通过联合国会员国选举而赋予我们的责任，高效率、高效益地执行安理会的任务，并推动改进其工作方法。

吴百纳女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同其他人一道向爱德华•勒克教授和大岛贤三大使致敬，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

我首先要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作为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出色地主持了关于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讨论，并在这一重要议题上保持了势头。我也感谢我们今天的通报者提出的振奋人心的想法和思考。

与其他国家一样，联合王国认识到安理会在过去一年中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具有挑战性的环境。我要向安全理事会事务司表示敬意，感谢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发挥的作用。我同意，采用虚拟工作方法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首先，我感到震惊的是，现在技术使我们能够如此轻易地吸收来自实地的更多不同声音--民间社会、妇女和平建设者和年轻人的声音--就像我们在2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做的那样。正如我们的十个当选理事国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应该继续这种做法。

第二，举行领导人级别的虚拟辩论增强了诸如气候变化对安全和脆弱性的影响等国际关切问题的可见度和份量。

但是，我们需要坦诚地认识到，存在一些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影响了安理会履行其任务的能力，包括应对新挑战的能力。灵活性不仅意味着能够召开会议；它还涉及对新出现的关切问题的反应能力，正如我们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那样，我们的工作方法抑制了这种反应能力。由于一个安理会成员的反对，安理会自去年3月以来没有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过正式会议。

这意味着，由于没有解决分歧的程序性机制，我们有时无法更实质性地讨论新的或现有的议程项目，也无法在需要时让公众看到并关注存在的问题。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重建得更好。我呼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实现三个目标，以便安理会能够在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其任务。

首先，在效力方面，安全理事会最好通过互动辩论、批判性分析、挑战、建立共识以及作出推进解决问题的决定来解决问题，从而完成其任务。有时这意味着更多私下讨论，而不是在公开场合讨

论，有时这意味着讨论一些可能让一些人不舒服的新问题。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安理会要保持相关性和有效性，我们就必须在冲突升级之前解决冲突风险。

第二，关于效率，我们都努力在限制在安理会发言时间方面取得进展。然而，举行冗长会议，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又不推动问题的解决，很少能够完成安理会的任务。

第三，关于透明度，正如我们今天上午多次听到的那样，我们必须与广大联合国会员国和公众保持相关性和联系。我们必须尽力解释清楚自己的立场。因此，我们支持恢复定期利用新闻谈话来提高透明度，并在我们同意时发出安理会声音。

与各种各样的通报人接触是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我们将继续促进民间社会参与安理会的活动。

最后，我欢迎有机会听到安理会成员和非安理会成员谈论我们还能如何重建得更好。当我们返回会议厅时，我们有机会重新设置，以确保我们能够面对21世纪的挑战，可信地完成我们的任务。让我们不要浪费这一机会。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为领导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所做的工作。我也要感谢西弗斯女士和兰德格伦女士提出的见解和建议。

安全理事会已经适应了这场卫生危机，但这种适应是有代价的:我们背离了议事规则，损害了本组织的基本价值观——使用多种语文。因此，我感到高兴的是，随着安理会返回会议厅，安理会现在正以所有正式语文举行公开会议和磋商。我们现在必须恢复我们通常的工作方法。这尤其意味着结束虚拟会议。在目前的卫生状况下，回归正常只能是循序渐进的。

法国赞同当选成员刚才表达的改革安全理事会及其工作方法的强烈愿望。我们致力于改革安理会，以加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此外，我们与墨西哥一道提议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自愿和集体暂停使用否决权。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上周五当选的五个新成员支持这一倡议。我们呼吁所有其他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加入这一倡议。

我们与所有伙伴合作，以确保秘书长的遴选程序透明和可预测。我们准备补充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S/2017/507，以提高效率、透明度和包容性。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提议将有助于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然而，我们在合并和澄清方面的工作不能以牺牲灵活性为代价。特别是，必须维护安理会任何成员国在任何时候就任何议题提交案文草案的自由。法国原则上不反对常任理事国担任附属机构主席。事实上，我们担任武装冲突中儿童问题工作组主席达四年之久。但是，将附属机构的主席职位分配给当选成员有利于定期轮换，这有助于防止阻碍工作并有助于出主意。

我们必须执行已经商定的建议。法国正与其在安理会的所有伙伴一道为此努力。我们与来自欧洲联盟、爱沙尼亚和爱尔兰的同事一起，为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确立了共同的工作方法。

我们还承诺让有关国家加入我们的倡议。我们向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尼日尔、南非和突尼斯——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A3+1)提出了谴责马里政变这一问题。昨天，在A3+1和法国的倡议下，通过了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人道主义局势的新闻谈话。我们正在与尼日尔合作，以确保安全理事会支持萨赫勒国家打击恐怖主义。恐怖主义造成许多平民受害者，布基纳法索最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继续与突尼斯合作执行关于冠状病毒病的第2532 (2020)号决议。

除了工作方法外，我们的优先事项必须是确保安理会每天有效性。我们支持以阿里亚模式举行互动对话和会议。它们有助于就重要问题向安理会通报情况。然而，这种会议不应以牺牲处理危机所需

的时间为代价添加到工作方案中。此外，这种会议必须保持非正式性。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必须避免举行过多公开会议，以免损害决策。我们花费太多时间相继阐述我们的国家立场，而花在努力达成妥协和采取联合行动上的时间太少。公开会议是重要的，但它们往往会使立场两极分化。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平衡。我们离这个目标仍然相去甚远。

我们指望非正式工作组主席和随后的安全理事会主席将我们的努力引向这一方向。我们将在7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为此而努力。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要感谢通报人洛兰·西弗斯女士和卡琳·兰德格伦女士的全面通报。我们同其他同事一样，赞扬爱德华•勒克教授和大岛贤三大使对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进行的研究。我们也感谢罗恩塔·金女士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整个代表团的发言，以及他们对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干练领导。

连续几年来，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参与下，以公开形式讨论了其工作方法。我们注意到，这一辩论已连续第二年在爱沙尼亚担任主席期间举行。

我们支持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广大会员国之间协调的重要性。我们相信，今天的辩论以及对现状本身的外部评估将对工作组的活动作出特别贡献，也有助于为其提供新主意，当然有一项谅解是，工作方法本身以及修改工作方法的任何步骤是安理会成员的专有权利。

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问题非常敏感。俄罗斯一贯认为，这方面的任何变革都应该旨在真正提高安理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能的效力和效率。诉诸不符合安理会工作具体性质的考虑不周的倡议不仅无助于取得成果，反而往往适得其反。

我们欢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团努力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我们注意到其修改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S/2017/507的打算，该说明作为安理会工作方法的汇编非常重要，而且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积极利用该说明作为重要的首要来源。我们随时准备协助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团进行这项艰苦的工作。我们认为，这项工作不宜操之过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协调一致，并侧重达成共识。

我们注意到非常任理事国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程序方面越来越感兴趣。这无疑有助于为安理会的工作制定最佳做法。

2020年对全人类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世界不得不面对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新挑战--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随之而来的卫生和疫情限制性措施必然影响到联合国的工作，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然而，尽管困难重重，安全理事会还是能够证明它有能力迅速、及时地适应新形势。制定了临时性非常措施，以确保其工作不间断地继续进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严格遵循了这种运作方式。

随着纽约局势的变化和重新开放阶段的开始，俄罗斯主张安理会成员在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迅速返回会议厅。为此，我们支持在去年7月德国担任主席期间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厅举行安全理事会第一次面对面会议。我国在2020年10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也奉行了同样的原则，我们在会议厅内新安装了有机玻璃隔板，成功地开展工作。

COVID-19大流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评估安理会面对面讨论国际议程的重要作用。显然，没有其他工作方法可以取代安理会成员之间的面对面互动。我想所有代表都会同意我在这方面的看法。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安理会逐渐恢复了在会议厅的正常工作。我们认为，在整个2020年和2021年部分时间使用的视频会议模式只在非常情况下采用的

临时性举措。正如提出时商定的那样，以视频会议模式举行的会议在程序上、法律上或逻辑上都不能被视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会议。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将这些临时措施制度化。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于去年的危机，我们有经验和解决办法，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已作阐述，我们总是可以回过头来予以采纳。

我们不否认视频会议有其好处，我们可以继续利用这种模式召开非正式会议。特别是，这种模式有助于大大扩大能够向安理会提供决策所需重要信息的人的范围。我指的是安理会工具包中的各种机制，如互动对话和阿里亚模式非正式会议。我们相信，这些形式只应用于提高安全理事会成员对安理会议程上问题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不支持任何混合模式，因为这有可能给安全理事会乃至整个联合国带来不可预测的严重法律后果。

我们继续提请注意安理会文件工作量过大的问题。安全理事会每年产生数百份文件。不幸的是，其中一些文件的附加值是值得怀疑的。经常观察到的对决议的过度微观管理也意义不大。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的最终成果应简明扼要、清晰易懂，最重要的是，应以行动为导向。

近年来，安理会审议专题议题的做法变得更加频繁，特别是那些根据《联合国宪章》属于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本全球组织其他机关职权范围的专题议题。这违反了既定的分工，分散了安全理事会处理其优先事项的注意力，而安全理事会可以而且应该就这些优先事项作出具体决定。

在安全理事会责任平均分配方面，执笔方问题值得特别关注。我们一贯主张扩大执笔方范围，首先是扩大到非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我们遵循第507号主席说明，其中指出，安理会任何成员都可成为执笔方，而且可由安理会多个成员担任共同执笔方。安理会任何成员不应将某些国家甚至地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也不应在特定问题上充当其导师。我们准备就这个问题与安理会成员进行建设性互动。

我们还要再次重申，在安理会工作中引入人为最后期限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安全理事会通过大多数决议的日期在安理会决定其当月工作方案的阶段就已经知道，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然而，许多草案继续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迟迟收到，这使得专家无法进行全面评估，更不用说进行有意义的磋商了。

有时人们会感觉是执笔方故意这么做，认为他们的同事可能在匆忙中根本不会注意到案文中有问题的地方。安理会决议的措辞有时会在投票前几分钟改变。由此产生半生不熟的产品，没有解决安理会成员的关切，并向秘书处提供了不明确的指示。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将继续同这种战术伎俩作斗争。我们不排除最终将被迫根据这些参数评估执笔方工作成效的可能性。

还提出了安理会访问的问题。我们支持恢复这一有益做法。访问不仅有助于听取安理会成员的意见，而且还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正在发生的情况形成自己的印象，并与安理会议程上任何特定局势中的关键利益攸关方接触。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无一例外。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白，某些国家在这些访问期间没有代表参与可能会被理解为一个政治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特派团包括所有成员。关于虚拟访问和混合访问，它们很难让我们实现我们为此类访问设定的目标。

最后，由于今天提出了否决权问题，我要强调，这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无关，而是安全理事会整个架构的基石，是实现安理会决定的平衡并确保这些决定有良好机会尽可能有效执行的关键。

德劳伦蒂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向爱德华•勒克教授和大岛贤三大使致敬。两人都为联合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个人与爱德华相识多年，非常荣幸能与他一起参加有关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小组讨论--主要是在

学生面前--在那些讨论过程中，爱德华会温和但坚定地纠正我对程序问题的解释。他一直都是对的。

我要感谢通报者们深思熟虑的发言。我们感谢金大使领导文件和其他程序事项非正式工作组进行富有成效和务实的讨论。非常感谢洛兰·西弗斯富有洞察力的陈述。她撰写了关于安全理事会程序的书，我们美国代表团经常查阅她的权威性专著。很高兴再次见到她。我们赞赏卡琳•兰德格伦所作的深思熟虑的通报，赞赏她和她的团队为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内容翔实的安全理事会报告而开展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坚持不懈，采用了保持连续性的创新方法，使之能够履行其重要职能。最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通过并实施了有关通过其决议的书面函件程序。通过这一重要措施，安全理事会确保它能够延长维和任务期限和制裁决议，并能够应对当今的各种危机，特别是COVID-19疫情本身。

安全理事会还能够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召开虚拟会议。通过利用视频会议技术，世界能够看到安全理事会继续听取通报，进行辩论，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然而，美国感到关切的是，这些虚拟讨论不具安全理事会实际会议的地位。由于虚拟会议不是安全理事会的实际会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并不适用。因此，由于疫情开始时安理会一个成员的反对，一年多来，安全理事会没有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正常运作，也没有举行“会议”。因此，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安理会实际上无法对程序性决定进行任何表决，即使安理会绝大多数成员可能会支持相关决定。

在第2条和第3条中，要求安理会主席召开安理会会议的基本规则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被削弱。这种状况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应当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在这场可怕的疫情已经过去之后也要解决，以便在安全理事会今后再次无法举行面对面会议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和程序依据。

毕竟，大会得以通过一项应急决定（大会第75/520号决定），使之能够在无法举行面对面会议的情况下对决议进行电子表决。安全理事会应该能够通过一项程序性决定，确定虚拟会议实际上就是安全理事会会议，而且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适用于虚拟会议。

最后，我们要表示深切感谢秘书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事务司、联合国口译员、以及联合国技术支助团队在整个疫情期间的辛勤工作。他们在幕后的不懈和重要努力使安理会能够继续运作——对此，国际社会应该予以感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金大使对所作的评论和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金女士（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让我有机会补充几点意见。

首先，我要感谢西弗斯女士和兰德格伦女士，其深刻见解无疑将启发我们在委员会对工作方法进行审议。我也感谢我的同事在本次辩论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显然，我们都致力于安全理事会的最佳运作。

应当重申，“旗舰”公开辩论会仍然是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接触的一个重要机会。在过去一年里，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对这种接触的质量构成了挑战。然而，安理会的应变能力没有削弱。因此，安理会得以创造性地调整其工作方法，以保持——在某些情况下加强——这种接触。

虽然我们未能以通常的形式举行这次公开辩论会，让更多的会员国实际参加我们的会议，但主席愿意为安全理事会在会议厅开会提供便利确实值得称赞。我们希望，下次举行关于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时，安理会和广大会员国能够一起在会议厅开会，继续这些重要的讨论。在此之前，我期待着阅

读会员国旨在加强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书面发言。

最后，我要回顾已故的爱德华·勒克教授所说的话。勒克教授在2020年5月向本机构所作最后一次通报（见S/2020/418）中提醒安理会——正如主席早些时候所指出——“最终的考验是这些措施会得到多么充分和忠实的执行。”他接着指出：

> “正如我们在507进程的各方面内容中所见，将商定的措辞付诸实践并不总是能够轻易、迅速实现。有些措辞听起来模棱两可、不够精确或者有开放的解读——换句话说，是外交辞令。监测结果的首要责任在于安理会成员，但在这一巩固阶段，外部观察员不应掉以轻心。”（S/2020/418，附件3）

在这方面，我重申，我们确实欢迎广大会员国提交书面发言。我们会怀念勒克教授的参与和他的智慧，但他的遗产无疑将会永存。愿他安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金女士所作的澄清。

我现在请西弗斯女士对所作的评论和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西弗斯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要表示赞同金大使的评论，即关于工作方法的这些年度公开辩论会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次，特别是在过去一年经历了如此不寻常的情况之后，有一些发言，对安全理事会如何开展其工作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我想我们都相信，从现在开始，不会一切照旧。

今天评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主席的作用在疫情过渡时期被视为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就如何继续强化主席的作用——不仅单独加强，而且要与其他主席合作进行——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建议。

我也要赞扬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工作。目前，S/2017/507执行部分段落再加上2019年底通过的八项主席说明，共有154个段落需要认真关注。这是大量的工作，也涉及较高的费用。与此同时，非正式工作组正在努力取得进展。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可以确认，容易的问题已得到解决，但更艰难的问题现已摆在工作组面前。

我也要感谢大家对我的通报和我的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程序》所说的客气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西弗斯女士所作的澄清。

我现在请兰德格伦女士对所作的评论和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兰德格伦女士（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与其他许多人一道，对大岛大使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去年，我同他一起向安全理事会作了通报。

非常鼓舞人心的是，听到许多人提到必须不断优化工作方法，这是一个持续的进程，而不是定期的过程。一位发言者谈到让能够抵御疫情的工作方法正规化。许多发言者指出与其他国家接触的价值、以及让他人——当然是其他会员国，但也包括全体公众——了解安理会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听到这方面的若干建议。如果我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也许值得回顾一下：安理会有一项选择，即在纽约之外开会。如果现在要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安理会发挥的作用，或侧重于某一特定区域、国家或区域组织，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安理会过去——在亚的斯亚贝巴、巴拿马、日内瓦和内罗毕——这样做，但2004年以来就没有再做过。既然我们提到过去一些有用的工作方法，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列入并予以审查的方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兰德格伦女士所作的澄清。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再次感谢今天参加我们会议的所有与会者。我还要感谢下列会员国到现在为止已就今天讨论的主题提交了书面发言：阿根

廷、奥地利、巴西、智利、塞浦路斯、萨尔瓦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科威特和新加坡。我们期待收到更多的书面发言。今天结束前收到的发言将被收入本次会议的发言汇编。

上午11时30分散会。